

本刊主编 曹波
本刊责编 李洪磊
雷琨
赵朝文
王琦
刘新华

邮箱:lnmrdx@163.com

新华视点



2013年5月10日 星期五

抗战时期可歌可敬的中国红会救护总队

抗战爆发后,中国士兵在前线浴血奋战,伤者颇多,但国民政府军中医疗力量极为落后,主要依赖中国红十字会在前线进行救护工作。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在南京国民政府西迁武汉。随后中国红十字会调整策略,放弃以往在大城市设置医院救护伤兵的做法,改为成立医疗队,奔赴各个战区进行战地救护工作。

在此背景下,救护总队应运而生。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习惯称为救护总队)在汉口成立,由林可胜担任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长。随着战局日益严峻,为安全起见,救护总队几经转迁。最终,1939年2月迁至贵阳图云关。此后,直至抗战胜利,贵阳图云关一直是救护总队的中枢所在。

艰苦条件

图云关位于贵阳市东黔桂公路上。在图云关的救护总队工作人员平时有1000多人,高峰时连家属在内有近2000人,队员们宿舍十分简陋,以稻草搭成屋顶,竹片编成墙板,既不防水,又不防寒。救护总队部的医疗人员大部分是协和医学院的专家教授,他们放弃高薪的机会,在图云关住草棚,吃粗粮,但大家都毫无怨言。

在前线的救护总队工作人员生活更为艰苦。如1941年第二队报告,在湖南战场上的救护队员,终日用红薯煮饭充饥,困苦万

状。1942年4月第三中队报告,队员每日所分配的米粮,仅能充饥。1942年10月第一中队报告,西北各队队员无不衣不衫履,薪酬微薄。此外,图云关还有一批国际友人。这批来自欧洲远渡重洋自愿来华的外籍医疗队共20多人,都是具有较深理论造诣和实践经验的内外科医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参加过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前线工作过,故而人们称他们为“西班牙大夫”。

军民兼顾

迁至贵阳图云关后,救护总队下属一室四股,比较重要的部门是医务股、材料股与运输股,其中,医务股领导医疗队从事战地救护工作,抗战初期救护总队下设三个医疗队,分布在陕西、江西、湖南等地。迁至图云关之后,医务股得到扩充,医疗大队增加至9个,中队增加至40个,区队增加至94个,另有手术队9个,所属各大队、中队、区队及手术队,在正面上按战区划分分配。除了正面上战地救护,救护总队也派出医疗队到延安和江西协助八路军、新四军,为敌后战场的将士提供救护服务。

救护总队运输股的主要任务是运送救护总队的人员及药品器材,也额外承担了运输伤兵的工作。战时的运输工作不但繁重,且充满危险,一方面是恶劣的路况与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危险,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日军的袭击。

据中国红十字会统计,1938年即有10多辆救护车被炸毁,司机损失多名,大量药材器械被毁。1942年救护总队新运第六队在缅甸进行医疗救护工作,救护车运送伤员赴曼德勒医治时适逢敌机袭击,有明显红十字标识的车被击伤达60处,红十字标记上也被机枪射有弹孔。

除了在军中将士提供救助之外,各医疗队也在驻地与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并开展传染病预防、难民救护等工作。如1942年救护总队就在贵阳开设了两个诊所,为贵阳市民提供服务。

在长期抗战中,分布于各战区的救护总队队员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抗战胜利后统计,从1938年1月起至1945年9月止,救护总队进行了大量救护工作,如外科共进行手术119856起,骨折复位35522起,敷药8784731人。在中国战场进行采访的英国女记者弗雷特·厄特利对救护总队节俭却又高效的工作感到惊讶:“一个完整的医疗队有20人,每月花费80英镑;一天能完成300个伤员包扎任务的护理队,每月开支仅50英镑。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经费是如何的节约。”

可敬可叹

救护总队医药物资中的大部分来自海外爱国华侨赠送,或以他们的捐款从国外

购买。除了爱国华侨外,美国也为救护总队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而这与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林可胜早年曾在海外学医,在欧美医学界和社会各界享有崇高声誉,在海外华侨中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多次赴美募捐,得到各界的积极响应。在林可胜任职期间,美国各界人士捐款给救护总队的款项达26600万美元。6600万美元在当时是个巨大的数字,南京国民政府年度预算也不过十几亿美元。

在林可胜的领导下,救护总队取得了骄人成绩,但林可胜却于1942年辞职。林可胜于1938年派出两个医疗队赴延安进行救护工作。后来新四军曾派人至图云关要求支援药品,林可胜按照新四军的申请主动加倍发放药品,并特别拨发了当时极为缺乏的奎宁。据说,蒋介石为此亲自召见林可胜,由宋美龄当翻译(林可胜汉语说得不好,一直使用英文),蒋责问林可胜为何按药材给共产党,林回答红十字会为国际组织。蒋介石则厉声说,这是中国。由于国民党当局认为林可胜亲共,林被迫于1942年辞去总队队长职务。林可胜为长期抗战的战地救护工作作出了贡献,令人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发的红十字会勋章中竟然没有林可胜。(袁灿兴)来源:《文史天地》

美国正组建40支网络部队

近来,美国官方及媒体大肆指责中国发起网络攻击,对美国的商业机密和关键性基础设施造成威胁。事实上,在拿黑客当攻击武器的技术方面,美国已经把其他国家都摆在了后头。几年前美军就成立了专门的黑客部队,最近,他们又公开在全球范围内招募黑客。这个时候妖魔化他国,确实有点“贼喊捉贼”的意味。

美军重视黑客

2005年,坐落在内布拉斯加州东部奥福特空军基地的美军战略司令部进行了大规模重组。其中的关键部分就是按照五角大楼的指示,秘密组建“网络战职能组司令部”,它的最高指挥官是四星上将,足见美国军方对其重视程度。

在美国参议院某次武装部队委员会听证会上,美军战略司令部多名高级军官不约而同地提到:美国“超级黑客”特种部队业已正式成军,其正式名称是“网络战职能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由世界顶级的电脑专家和“黑客”组成。

在正常情况下,“黑客”特种部队的任务是保护美国信息网络系统的安全,防止敌国“黑客”对其实施渗透、攻击。一旦爆发战争,这支特种部队将担负渗透、监控、摧毁敌网络系统以及窃取情报的任务。

据美国防务专家乔尔·哈丁2010年的评估,美军网络战部队总数近9万人。随着近年来的不断壮大,目前已经超过10万人,远超其他国家。一支规模如此庞大的网军,一旦集中发动攻击,任何国家和机构都将难以承受。譬如某国家的导弹发射架已经就绪,在摁按钮时才发现被植入了错误的命令,那么打击的不是对方的领土,打击的是己方,这个完全可以由黑客通过无线注入的方式,利用网络来操作实现。

黑客大会招兵买马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网络安全形势,美国军界对自由黑客采取长期的招安策略。现在,他们的网络部队还有扩大的趋势。今年3月12日,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亚历山大表示,美国正组建40支网络安全部队,任务是打击对美国发动电子攻击的

威胁,这次网络部队的扩张定位也很明确——不在于防守,而在于进攻,所有40支部队将在2015年秋季前全部建成。

其实,美国以往也有招募相关的黑客进入部队,但行动都没有这次高调。拉斯维加斯每年都有黑客大会,美国国防部官员都会到那里去。虽然这些美国特工部门竭尽全力招兵买马,可是感兴趣的黑客为数不多。美国政府给的薪水不够高,黑客们也不愿干这些特工部门纪律严明的做法。不过也有一些黑客或是厌倦之前东躲西藏的生活方式,或是被联邦执法机构抓捕在案,被迫以此换取自由,便选择了加入美国特工部门或者军方间谍机构,演出了一幕幕“以黑制黑”的精彩戏码。

美国国家安全局与卡内基·梅隆大学还联手举办过“高中黑客大赛”。主办方特别表明:“您不需要已经是一个黑客才可参加,我们会教你需要知道的东西。”比赛官方网站上特别标明本次比赛由美国国家安全局提供赞助。

谁是最大网络威胁?

美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抹黑中国,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就好比美国通过“黑客”技术,将中国的“形象网页”硬生生地改成一幅美国自己绘制的图片,上书“美国网络安全最大威胁”几个字。

众所周知,网络安全是全球性问题,网络攻击是全球许多国家都遭遇且非常关切的综合安全挑战。在遭受网络安全威胁时“妖魔化”他国,并不能为美国自身的行为增添合理性。美国在谴责其他国家网络战争行为时并未提及,美国军方一直在积极为网络战争作各种准备,而且这种准备和能力并不是什么秘密。

已经有媒体指出,奥巴马在网络安全问题上貌似正在导演一出“带有紧张要素和反派角色的政治戏剧”,他正等待着戏剧能够达到的效果——推动网络安全立法。很明显,这个法案可以确保美国拥有实施“网络安全先发制人”打击的权利。

由是观之,美国近来大肆炒作网络威胁,极有可能就是为扩编网军做铺垫。(别傲)来源:《看世界》

■人文拾贝

司马迁首创“中国人民”一词

先秦时还没有“中国人民”这个词,当时“中国”和“人民”都是单独使用,词义也不同于今天。“中国”本意指京城,如《诗经·大雅·民劳》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诗传就训释为:“中国,京师也。”后来,“中国”也引申指中原地区、天下之中心等。

而“人”与“民”,在先秦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说文解字》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民,众萌也。”

那么,“中国人民”作为完整独立的语音单位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出现的呢?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山西、山东、江南、塞北等地的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爱”,这里的“中国人民”,虽与先秦时的意义并无大差别,但它却第一次将两者连在一起,构成偏正词组,所以说是司马迁最早创造了这一词汇。来源:《羊城晚报》

钱钟书不读陈寅恪著作

1998年5月14日,杨绛发表了《吴宓先生与钱钟书》一文,说:“钱钟书在《论交友》一文中曾说过:他在大学时代,五位最敬爱的老师都是以哲人、导师而更兼做朋友的,吴宓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我常想,假如他有缘选修陈寅恪先生的课,他的哲人、导师而兼做朋友的老师,准会增添一位。”

其实,杨绛所说的并不完全符合事实。钱钟书在清华读书时是完全“无缘”选修陈寅恪先生的课的,只是可能由于当年他年轻气盛,不但没有把痴情老实的吴宓放在眼里,也没有把陈寅恪当回事儿,因而也就不去选修陈寅恪开设的课了。这并非“无缘”的问题,而是“有缘”而不屑去接缘罢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后来,钱钟书曾多次批评陈寅恪的学术观点和著作。

首先,钱钟书对陈寅恪的著作《元白诗笺证稿》根本不屑一顾。据资料显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出版后曾赠送钱钟书一册,钱钟书只略微翻了翻就束之高阁了。钱钟书在一封信中毫无掩饰地说:“不喜其昧于词章之不同史传,刻舟求剑,故未卒读也。”

而在致中华书局的著名编傅璇琮的信中,钱钟书更明确地说:“弟今春在纽约,得见某女士诗词集印本,有自跋,割裂第三十五年前题画诗中两句,谓为赠贻之作,他年必有书呆子据此而如陈寅恪之考《会真记》。”很显然,在他看来,所谓“以诗证史”的《元白诗笺证稿》其实是“刻舟求剑”式的书呆子之作,根本不屑一看,稍稍翻了几天就密封了起来,没有“卒读”。

第二,钱钟书对陈寅恪的一些考证更是不以为然。钱钟书在其著《宋诗选注·序》管见篇以及《与外国学者的书信交流中,常有直接或间接地批评陈寅恪治学方法的言论。

如1978年钱钟书访美国的一次演讲中曾经说,解放前一位大学者“曾凭自己的渊博知识和缜密的细心,考证唐代杨贵妃入宫时不是处女问题,而是‘这是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书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尽管钱钟书在讲话中没有直接点出陈寅恪之名,但在听众听来却不难知晓这个所谓“大学者”就是陈寅恪无疑。

钱钟书对陈寅恪的评价使人想起了陈寅恪还活着的时候,中山大学的老师们就曾指责,批判陈寅恪研究杨贵妃入宫前是否处女的问题,认为这是无聊之极,无聊之极。这在当年的学术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当然,陈寅恪为什么研究这个学术问题,其研究到底有没有价值,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不过,钱钟书在美国访问期间又旧事重提,不点名地批评了陈寅恪的研究,至少表明钱钟书在这一点上坚持了真正的学术良心,表现了不为尊者讳的实事求是精神。(陈福季)来源:《书屋》



生活的重压

▲近日,在印度尼西亚的日惹,一名妇女背着一大袋蔬菜下楼梯。当地有一些像她一样的女搬运工靠背运蔬菜、水果和干货谋生,但收入非常拮据。来源:中国新闻网

东京审判,中国大法官梅汝璈用法律捍卫正义

梅汝璈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作为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代表,他全程参与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运用法律武器捍卫了国人的尊严。

但这场正义的审判近来却遭到某些日本右翼政客的质疑和否定,今年恰逢梅汝璈逝世40周年,我们重新梳理审视这位法学奇才的传奇一生和那场举世瞩目的大审判,无疑具有更为强烈的现实意义。梅汝璈有一句流传甚广、令人深思:“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出任远东军事法庭法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取得胜利的同盟国分别在德国纽伦堡和日本东京设立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前者的名称是“国际军事法庭”,后者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但人们一般称这两个国际军事法庭为“纽伦堡国际法庭”和“东京国际法庭”。

1946年2月15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政府的提名任命了11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中、美、英、苏、澳、加、法、荷、新、印度、菲等国各一名。其中,中国法官就是梅汝璈。

中国法官梅汝璈当时年仅42岁。他早年从清华毕业后留学美国,获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多所高校担任法学教授,长期从事英美法学的教学工作,舆论对其评价颇高。梅汝璈的经历和学识使他成为军事法庭法官的最合适人选。多年以后,梅汝璈之子梅小璈忆及此事时说:“据说当时有人很欣赏并推荐了我父亲,包括东京审判中的中国首席检察官哲夫先生,他是我父亲在清华时长年四届的师兄;还有曾任民国外交部次长、教育部长之王世杰先生。”

国民政府最终同意梅汝璈代表中国法官东京,1946年3月20日,梅汝璈从上海飞抵日本,正式履行新职。

初到东京

梅汝璈到东京履新之初,便与一些西方的同行有过辩论和争执,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座次之争了。法庭庭长是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澳大利亚法官

韦伯爵士,他想让两位与他亲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于是便提议法官席次应按联合国安理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

梅汝璈不同意韦伯的意见,他认为法官的座次应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这样美国和中国便分处第一、二位,分别位于庭长韦伯的两侧。

对于梅汝璈的提议,几个西方国家的代表不以为然,韦伯也不愿接受。梅汝璈愤怒地说:“我拒绝接受这种不合理的安排。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中国受害最深,抗战最久,牺牲最大,而英国却只是一味地忍受和投降,中国绝不能接受排在英国之后,我认为中国政府也不会同意被安排在英国之后!”随即他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以退出预演相抗议。

最后一刻,法庭终于接受了梅汝璈的意见,没人能够承担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责任,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了。

对于梅汝璈在远东军事法庭上的表现,梅小璈在回忆文章中评论说:“先父本是一介书生,思想、行为带着明显的清华烙印,对于个人的升沉显隐、进退穷达并不在意,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祖国的千百万同胞经过长期而惨烈的抗争,在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终于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以胜利者的姿态,以审判者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出现在国际军事法庭上,而先父个人又有幸承担了这一使命的时候,那么,‘郑重其事’(先父日记中语),勉力而为,不辱使命,便成了唯一的‘选择’。”

法庭内外的较量

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处根据同盟国的意见选定了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对象。但在这个战犯名单里,并没有出现日本天皇裕仁的名字。作为日本的最高元首,裕仁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争结束后,国际社会要求审判裕仁的呼声极高。但出于对战后利益的考量,美国政府和麦克阿瑟宣布“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也不起诉天皇”,理由是《波茨坦公告》允许日本在战后保留天皇制度。

梅汝璈主张审判裕仁,他在与其他法官交流这个问题时提出,保留天皇制度与起诉裕仁并不矛盾,可以由新天皇即位,同时起诉裕仁。

梅汝璈的主张得到了其他一些法官的支持,日本天皇由此也差一点儿被送上了法庭,只是后来由于麦克阿瑟的庇护,才侥幸逃脱了法律的审判。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的时间。在起草判决书时,梅汝璈认为对于日本侵华战争,中国人受害最深,最具发言权,主张日本侵华罪行这部部分应由中国人书写。法庭接受了梅汝璈的提议,决定由他负责起草判决书第四章《日本对华侵略》的起草工作。

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当时庭审工作已经结束,各种资料,证据堆积如山,梅汝璈和他的助手竭尽全力,向法院提交了200多页,长达十余万字的判决书草稿,获得了法官会议的认可,为东京审判作出了贡献。

梅汝璈在远东军事法庭的另一件壮举就是将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等对国际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战争罪犯依法送上了断头台。

在法庭判决阶段,由于各国法律体系以及法官对法律的理解不同,所以在给被告定罪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也没给庭审提供具体的量刑依据,庭长韦伯主张将战犯们统统流放荒漠,正如对待当年的拿破仑;而印度法官巴尔博士则主张无罪开释全体战犯,理由是“世人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英美法官支持死刑判决,但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那些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战俘的战犯身上,对其他战犯则态度暧昧。

“若不严惩战犯,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面对这种局面,梅汝璈忧心如焚,夜不能寐。他查阅了卷帙浩繁的资料,向法院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例如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曾采用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等令人发指的暴行,主张对首恶必须处以极刑。

在梅汝璈的不断交涉、周旋下,许多

法官认同了他的观点,最后通过投票,决定判处7名战争罪犯死刑。

被遗忘的法律精英

东京审判结束后,梅汝璈被南京政府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司法部长,但他对国民党政府已失去信心,于是托词滞留日本,未回国就职。1949年年底,梅汝璈从日本辗转返回北京,担任了政务院外交顾问。

众所周知,1949年后新中国学科建设基本上沿袭了苏联模式,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院校保留了法律系,并且讲授的内容也都是苏联法学。在当时那个年代,抗日战争虽然常被宣传,但东京审判却很少有人提及,其中细节更是鲜为人知。

在这种形势下,梅汝璈和他曾执著坚守的英美法学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为新时代所遗忘,难怪他在一份检查里酸楚地写道:“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书而已。”

直到1962年,梅汝璈开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的撰写,但是,他只写完了四卷。1980年代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法律出版社正式出版,出版前梅小璈对社长蓝明良说,这本书还没写完。蓝明良回答说:“就是半部,我们也要出版。”

那一年,恰好是东京大审判结束40周年,而这场审判的亲历者和这本书的作者梅汝璈已逝去十余年了。但是,梅汝璈的功德正如镌刻在铜鼎上的金文,岁月消磨不去。为了纪念这位传奇大法官,2011年,南昌市青云谱区政府启动梅汝璈故居抢救修缮工作,斥巨资按照“原址修复、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缮加固,修葺一新的梅汝璈故居有望于今年5月底对外开放。修建开展好梅汝璈故居将冲刺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and 南昌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如今,在这所距离南昌市中心10多公里的故居,现年81岁的梅汝璈堂弟梅汝璈老人一直在此义务担任讲解员,“我要让我的子孙后代感受梅汝璈的英雄气概,让他们从小就树立远大志向。”

综合《法治周末》《南昌日报》及中新网整理

1952年伦敦大雾致1.2万人死亡

编者按:上世纪50年代,伦敦尝到了工业化的恶果。当年曾经安居伦敦的老舍先生描绘为“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致辛辣的、呛人的”伦敦雾霾,1952年12月4日变成了震惊世界的杀手;而如今的伦敦,已有很多年看不到旧时文学作品经常描绘的“雾都风情”,偶尔在冬季或初春的早晨才能看到一层薄薄的白色雾霾,空气污染带来的困扰早已消散在每天清爽的空气中。伦敦治理空气污染的举措,对当前中国有什么启示?

这两天,前一阵子的“十面霾伏”卷土重来,这让我回想起1952年伦敦大雾引发的灾难,当时有1.2万人死亡,而1952年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现在大致相当,这也许并不只是巧合。伦敦污染灾难难以之后英国空气状况的改善或能令今天的中国提供某些有益启示。

1952年12月的伦敦大雾持续了5天,当时能见度只有几米,找到路的唯一办法是沿着马路护栏和房屋行走。人们根本看不清交通状况,过马路必须靠听觉,造成污染的最直接原因是发电站和普通家庭使用的煤炭以及汽车尾气。

这次伦敦大雾引发的直接死亡人数达到4000至6000人,其中主要是儿童和患有呼吸疾病的人群。这是一场全国性灾难。如果按照中国的人口规模换算,相当于8万人死亡。大雾带来的严重影响还加重了人们已有的病情,并非所有死亡人数都立即进行了登记。估计最终的死亡人数为1.2万人,换算成中国的人口规模,则将近25万人。

由于1952年的伦敦灾难带来严重后果,英国首次推出严厉措施控制污染。1954年,伦敦通过治理污染的特别法案。1956

年,《清洁空气法案》获得通过,成为全国通行法律。法令禁止使用多种燃料,提高工业烟囱的最低限高,并将发电站搬出城市。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推出举措清除泰晤士河。由于污染严重,当时的泰晤士河里看不到一条鱼,甚至跌落河中的人还被要求进行常规防疫接种,这些措施日积月累产生的效果是巨大的。最为重要的是,伦敦再也没有发生像1952年那样严重的大面积死亡事件。此前,清洁空气法案也会加剧污染。因为它们的出现是很快变脏。现在,它们又都变干净了。泰晤士河里又重新出现鱼的身影,人们已经习惯到泰晤士河钓鱼。慢慢地,困扰伦敦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污染恶名得以解除。

我的结论是,首先,英国为工业化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也是如此。两国人民都摆脱了贫困,但却是建立在大规模环境破坏的基础之上。其次,即便是在人口总数远远小于中国的英国,要根本扭转这一局面也需要花上10年至20年的时间。

但这种矫正并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它需要政府下决心制定政策以及公众的支持,自由市场和低投资水平并不能解决污染问题。自由市场会产生污染,因为环保技术通常成本高昂,低投资水平同样也会加剧污染。为避免灾难再次出现,需要政府进行严格管控并对清洁发电站和相关产业进行巨额投资。这是治理环境问题的唯一经济途径。鉴于比英国庞大得多的人口规模,希望中国永远不会对伦敦1952年那种灾难。

(约翰·罗思议,伦敦市前副市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来源:《南京日报》

视界延伸

由于版面所限,我们搜集的许多优秀稿件都没能和读者见面,颇为遗憾。为此,特辟《新华视界》网络版,加进去了那些遗珠美文,有兴趣的读者请登录<http://www.xinhuanet.com/mrdx/xhsj.htm>。下为本期网络版部分标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贪污浪费与“三反”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部分干部出现了奢侈享受、贪污浪费等行为,引起了中央的极大关注。

物勒工名:古代的责任追溯制

在明朝,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就已经开始推行“质量追溯制”,如工匠要在城墙的砖头上写上自己的姓名。

1960年代,美国曾打算核打击中国核武基地

1960年代,在中国核开发过程中,持敌对立场的美国竟多次密谋,试图以“先发制人”核打击予以消灭。

《30多年前的铁岭警匪枪战》

《墨菲定律的众多变体》

《陶渊明和杜甫的房子问题》

《看看古代官员的“福利分房”》

《蒋介石爱看“梁祝”,好闻咸鱼腥味》

《曾国藩四条遗嘱引领家族长盛不衰》

《变老的十大好处》